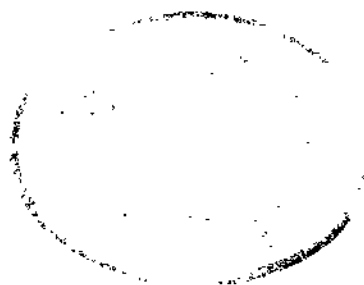


23.12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

南溪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九辑

94204/2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第十九辑目录

- 纪念战时儿童直属第三保育院成立五十周年…黄金轩(1)
- 回忆南溪县地方国营工业发展概况……………张心惠(14)
- 建国四十周年以来的南溪水利建设……………钟廷继(25)
- 解放后南溪县酒类生产发展概况……………徐士鹄(30)
- 忆宜井公路南溪段经修片断……………徐思孔(37)
- 仙临场的太阳肉……………邓定平(40)
- 谭醪糟……………谭俊成(41)
- 抗日战争时期李庄学校教育的发展变化情况…黄忠奎(43)
- 南溪一中史事简介……………郑高宗、王应容(49)
- 桂轮中学建校情况……………王续年(60)
- 我在龙腾学区的教研师培工作片断……………作郑高文(63)
- 本世纪50年代初的少先队……………郑高宗(68)
- 翻身农民学文化……………于天(71)
- 钟灵街小学在前进……………刘亨祥、唐清泉(76)
- 南溪县文艺工作团概述……………刘国钧、张才贵(83)
- 南溪县川剧团简介(上)……………郑国辉(89)
- 南溪解放初期区一级政权建立的概况……………包楷文(96)
- 回忆仙临乡征粮剿匪工作中的点滴情况……………刘绍儒(99)
- 有关奎星阁点滴……………包楷文(104)

纪念战时儿童直属第三保育院

成立五十周年

黄金轩

五十二年前，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吞噬亚洲，进而称霸世界，发动了罪恶的卢沟桥事变。1938年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我可爱的家乡——湖北江汉平原上的汉川分水镇，残杀了我的父亲和两位叔祖，同难者三百余人。

国破家亡的生活苦难熬，为了生存和报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1939年4月30日（农历三月十一日），当我得知政府有人收容小孩到四川读书的喜讯后，就毅然与本村另外三个小家伙结伴离乡，到汉江之南的县府临时所在地参加了难童收容队。次日（5.1）离县，途经仙桃、长湖、沙市、宜昌，乘轮入川。大约在5月中旬，到达战时首都重庆市。几经周折后，6月初终于在新组建之直属第三保育院安定下来。从此开始了我长达七年多的抗日流亡生活，我也由一个无知的村童成长为一名具有中专文化的青年。为了不忘过去，激励来者，教育后代，特将我在直三院两年多的亲历见闻述后，以飨读者。

一、五十年后忆往昔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1938年3月10日，当时我国妇女

界的杰出代表们聚首武汉，创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为中国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出了光照日月的贡献，使3万抗日遗孤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获得了生存权与学习权，并在党的启蒙教育下，逐步培养成长为祖国各方面的有用之材。保育会属“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领导。同年秋，随着战局的变化，保育会也随国民政府撤离武汉，迁来四川“陪都”重庆。

抗战期间，全国包括陕、甘、宁边区在内，共有50多所保育院，3万多名保育生。这些儿童少年多来自各沦陷区，其中，部分是抗日将士的子弟与遗孤，多数则是战争中失去爹娘的孤儿或浪迹街头的贫家子女。当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有为数不多的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最小的是个别年仅两、三岁的幼儿，而大多数则是6~12岁的儿童少年。

“孩子是国家的小主人，……他们该有幸福与天真，他们该在欢乐的童年中长成。可是，祖国的孩子们，已被烙上了多少惨痛的创痕。谁忍看，孩子们焦愁面忧伤？谁忍看，孩子们饥饿与死亡？祖国在生死的边缘上动荡，孩子在苦难的歧途上彷徨。救救孩子！请为下一代着想。”这首抗战时期流行于重庆地区的话剧《小主人》的主题歌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呼声，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一致呼声。“救救孩子！”是当时全国妇女界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神圣使命和爱国救亡的紧迫任务。

在“救救孩子啊，请为下一代着想。”的倡议和号召下，成千上万的孤儿得救了。他们从政人的刺刀下，在饥饿的乞讨中，被抢救出来，然后辗转流离，来到大后方，再被分配到各个保育院中，及时获得良好的保育环境和接受爱国

主义与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

半个世纪过去了，昔日的少年今已白头，渐次走入离退休者的行列。在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岁月里，这些抗日时的流浪儿，在各条战线上，为了祖国的独立、尊严、富强和今天的“四化”建设，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智慧，作出了应有的奉献。早年，许多保育生投笔从戎，参加抗日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人民志愿军的行列，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反动派和建立人民共和国立下了功勋；为抗击美帝而血战在朝鲜疆场。建国后，处于青年时代的保育生们，风华正茂，他们用忘我的劳动，为新中国的建设而战斗，成为时代的骄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先后成为先进生产者 and 劳动模范，获得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有些已是著有成就的教授和各类高级专家；有的则在艺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了精湛的造诣，赢得了人民的喜爱；许多人成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或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更多的保育生则数十年如一日地长期坚持战斗在中、小学教育岗位上，发挥着老园丁特有的春蚕和红烛作用，为祖国培育了几代合格的人才，而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也有少数人走完了人生的旅程，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是什么原因使众多保育生在不同环境里几十年如一日地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呢？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多具有很深的阶级仇和民族恨，这是“先天性”的因素；解放后，大多较早地参加了党、团组织，在党的关怀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这是主因；此外，这也与五十年前中共中央南方局通过派遣部分优秀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对我们所进行的启蒙教育是密不可分的。1931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渝成立。我们党利

用她在抗战初期的合法地位，在分管妇运工作的邓颖超同志具体指导下，巧妙地在这个阵地上进行了艰苦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因而使我们这群苦难的孩子得以健康地成长起来，并受到早期的革命洗礼。这使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心情仍难平静。我们由衷地感谢那些曾日日夜夜为我们付出心血和爱心的老一辈优秀的保育工作者们。祝健在者长寿！愿谢世者安息吧！

二、危难的祖国，苦难的孩子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在对日作战中节节溃退，祖国大好河山被蹂躏，弄得遍地狼烟，大片国土沦为侵略者的屠场。灾难深重的人民，遭到空前浩劫：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孩子失去了亲爱的爹娘，到处流浪。

1939年春，我这个12岁的农村少年，为了生的权利，为了长大后能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与同村三个年龄相近的晚辈（11岁的侄子黄超霖、13岁的孙辈黄秀国和12岁的侄外孙彭耀南）结伴辞别家人和乡亲，逃出了虎口，在“难童收容站”工作人员带领下，向大后方四川转移。一路上，常遇日机空袭，又受饥饿与疾病折磨，再加上初次离家对亲人的思念，真把我们这群流浪儿拖得十分狼狈不堪。5月中旬，好不容易抵达重庆。为了躲避敌机日夜不断地狂轰滥炸，当晚即换乘木船，溯嘉陵江到北碚附近的白庙子上岸，在水岚垭暂住下来，等待分配。

已入初夏，天气渐热，我们蓬头垢面，每人身上仅穿一套还是离家时的黑白难辨、虱子成串的衣裤，身上早已散发

出一股难闻的怪味，瘦弱得活象一只只小毛猴。我们没有固定的住所，那些闲放着的运煤小车厢、铁斗车和居民的屋檐竟成了我们的“临时宿舍”。吃饭更成问题，每天不定时地拿出两次稀饭来，大群小饿鬼就一拥而上，我瘦小体弱常因挤不进圈而唱“卧（饿）龙岗”。在短暂的日子里，饥饿与疾病接连夺去了十几个小伙伴羸弱的生命，死神还继续威胁着其余的人。

此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股风声：“快跑，到延安去！”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它在哪里？对此，我们都一无所知。在一个夜晚，难童中突然骚动起来，我抱着好奇的求生欲望，盲目地跟随一群人，沿着条运煤的小铁路向白庙子方向偷跑了。但不妙，很快就被“难童收容队”的几个“押运员”发现了。他们手执鞭子和木棒，凶神恶煞地把我们硬追赶回去，然后把这些“小逃犯”关在一间他们居住和工作的大屋子里罚跪、饿饭、训话，还警告我们说：“以后谁要再敢偷跑，就打断他的腿杆！……”这更加重了我们心灵上的创伤，此情此景使大家更想家了，常相互泪眼相对、泣不成声。

幸好，不久就开始调动了。一个傍晚，我们被带到10多公里外的金钗山（戴家沟西面）即将成立的直属第二保育院。但不巧，调去的人超过了古刹的容纳量，我和一小部分人，第二天仍被带回水岚垭。几天后，我们又与新来者被调到15公里外的江北县土主镇。这是一个比较僻静的场镇，我们被暂时安顿在场上一座临街的庙子里，这里很少有敌机来侵扰。数日后，我们正式迁入场侧半公里的“周氏宗祠”定居下来，工作人员渐次增多了，院长赵郁仙（即赵君陶，“我党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忠诚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李硕

勋烈士遗孀、赵世炎烈士的胞妹、李鹏总理之母）受南方局派遣到任了（她老人家1982年9月9日给我的亲笔信中说：

“我办保育院是由南方局领导、是属于统战性质”的。）。但疾病和死亡这时正严重地折磨和摧残着我们。在最初约月余时间里，在我们这个三、四百人的集体中，又被病魔夺走了二、三十条小生命。在我同村的四人中，侄儿翹霖（平娃）不幸夭折；孙辈秀国（梅成）因病危被送重庆抢救（此后我与他就再未见过面了）；我也在疾病中挣扎。……。

抢救生命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这所在6月2日新成立的直属第三保育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全院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全力解决好孩子们的食、衣、住、病四大难题。院长“赵妈妈”常因孩子们的死亡和病痛而焦虑、流泪，她为我们不辞辛劳地东奔西跑；全院老师和职工也日以继夜地忙碌不息。经过一致努力，疾病被扼制住，死亡被战胜了；生活上一日三餐正常了，而且每周还能打一次“牙祭”；我们睡上了双层新木床，盖上了自己学习缝制的白被套；同学们身上穿了新的绿色童军服。大家的身体慢慢长好了，小脸上绽开了笑容，思想安定，心情开朗了。院长、老师们亲如家人的关怀和爱护，在一定程度上，也医治了我们心灵上的创伤，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和新的希望，从而也就转移了我们对老家和亲人们的思念之情。我们已开始感到有了一个新的家！

三、我们新的“家”

“我们离开了爸爸，我们离开了妈妈。我们失掉了土

前，我们失掉了老家。我们的大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军阀。我们要打到它！……我们不依赖爸爸，……我们自己求新学问，我们自己创新的家。我们的好朋友来自日本军阀的炮火轰炸下，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一齐来打回老家；帮助他，一齐去看望爸爸妈妈。帮助他，一齐来建立新中华！”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每当我们深情地歌唱这首由安娥作词、张曙谱曲的《战时儿童保育院院歌》时，总不禁潸潸泪下，也很自然地增加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痛恨；感到这个新的集体大家庭的无限温暖。

生活导入正轨后，新的课桌凳和黑板运来了，我们的班、组也编好了。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本组织形式，叫做“生活团”。“赵妈妈”为了让我们牢记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欠下的血债，还创造性地给每个“团”均冠以一个日军侵华所酿成的国耻纪念日。按历史顺序由近及远，就学生的文化程度则从高到低地命名为“八·一三”、“七·七”、“一·二八”、“九·一八”、“五·三”、“五·卅”、“五·九”、“五·七”等。每个“团”各分配两位老师共同管理：一人抓生活，一个管学习。我所在的“一·二八”团是两位女老师，广东籍的许定坚抓生活，教算术；河北籍的鲍菊英管学习，教语文（后来由四川合川的唐心一先生教语文，他的毛笔字写得好）。我们这些长期被学生生活梦寐以求的“难童娃”终于成为“勤工俭学”的小学生，开始如饥似渴地沐浴于知识的海洋中了。

“周氏宗祠”的大门框挂上了一块冯玉祥将军书写的隶书、白底黑字的长吊牌，文曰：“战时儿童保育会直属第三保育院”。这就是我们三、四百孩子的新家。我们的家长

——赵郁仙院长，是孩子们尊敬的“赵妈妈”，她身材修长，满脸慈祥，对每个孩子都如己出，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大家的全面成长。老师们大都比较年轻，工作上积极热情，和孩子们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就象我们的叔叔、嬢嬢、哥哥、姐姐一样。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其中部分人，他（她）们中有好几位就是中共党员。共同的爱和恨，把我们凝结成一个团结友爱的大集体。我们互相勉励，共同进步。我们的院训是：“团结、友爱、诚实、活泼”。在这样的集体中，我们象获得适度的阳光和雨露的禾苗一样，健康茁壮地发育成长起来了。

四、全面发展的新教育

——我在抗战中的进步

直三院吸收和借鉴了苏联的先进经验，注意了对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育。注重“向生活学习”和重视“手脑并用”。整个学习与生活，带着半工半读性质。

（一）德育，保育院对我们的思想品德教育抓得很紧，除了在日常生活与教学中结合进行外，每周周会上有时事讲话，并编写《时事简报》。办公室订有《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同学们只需喊一声“报告！”在获得老师同意后即可入室自由阅读。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院长还专门自重庆《新华日报》请来我院某女老师的爱人刘同志给我们作形势报告，院长和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爱国、诚

实、勤俭、好学。做有益于社会和百姓的人，还用孙中山先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教导勉励我们。我们曾先后填过几次《志愿表》，我记得大家多是：长大后“当兵打日本鬼子！”“做一个技术工人，建设新中国！”1940年秋，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妈妈到三院视察。当天遇到“跑警报”，留院的几十位师生，临时集中在“九·一八”团教室里，欢迎“冯妈妈”给我们讲话。当时她大约40岁左右，健康朴实，身穿一件毛兰布的旗袍，脚着青色平底布鞋，面带笑容，慈祥可亲。她的讲话简洁易懂，希望我们具有“狮子一样的勇敢，猴子一样的机灵，骆驼一样的韧性”。

我们的语文课本是保育总会专门编印的，由白桃主编，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内容。我上的第一课课文就是：“打打的，的的打，日本出兵啦！日本兵来做什么？哥哥走去对它说：‘小日本，你来做什么？’弟弟走去对它说：‘小日本，你来做什么？’小日本，说不出，拿起炮来轰！轰！轰！”另一题为《谁说我们中国穷？》的课文：“谁说我们中国穷？我们中国有米、麦、大豆、丝、茶、棉、麻，还有煤、铁、金、铜，我们中国哪里会穷！”每次作文课也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来进行。

在院图书室里，摆着《二万五千里长征》、《八路军出马打胜仗》、《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小夏伯阳》、《表》……等书，我们会唱很多抗日进步歌曲，除了《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游击队歌》、《长城谣》、《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等一般歌曲外，我们还会唱《延安颂》（当时公开叫《古城颂》）、《延水谣》、《太

行山上》、《五四青年节歌》、《一二九纪念歌》以及苏联的《伏尔加船夫曲》、《囚徒歌》等。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名字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是与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同受尊崇的。我们知道苏联帮助我们抗日，是中国人民的真朋友，懂得应该热爱工人、农民和抗日军人，热爱劳动的道理。我们做错了事，从不隐瞒，能主动大胆地认错、改错。

赵妈妈和老师们在教育方法上，多采正面启发式予以诱导促其转化外，很少进行体罚。我们这些失去亲情的流浪儿，真正做到了爱院如家，不愿惹自己所敬爱的院长和老师们生气。相互间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似乎谁也离不开谁了。如教导主任杨秉云（女）离院时，同学们都依依不舍地送至院门失声痛哭了；杨老师也满脸泪花，几步一回头地慢慢消失在远方……。

为了向姊妹单位学习、互相交流和奖励优秀生，1940年春暖花开的4月间，赵院长亲自带领了全院三十多名优秀保育生组成的一个童军中队，到北碚教养院、慈幼院，江北水土沱的川八院和金剑山直二院等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这次活动在全院震动较大，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在北碚，我摄下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珍贵留影并保存至今，令人欣慰。

（二）智育，每天早操归来要上朝读课（即早自习），只闻全院一片琅琅读书声；规定的书法练习，老师也要求我们一笔不苟；作业更不能欠帐。我们的座右铭是：“今天的事，今天毕；不要等明天，明天还有新事做。”三院曾试采取“弹性升级制”，就是升级可以不受学期的限制；同

时，语、算也可在不同年级进行学习。这样便于因材施教和鼓励积极上进，我在小学阶段就因此先后获得三次跳级的机会。1939年，在许定坚老师指导下，我的算术从认数字、识数到完全掌握多位数的四则运算，仅用了两三个月时间，它不但激发了我此后对数学课的特别爱好，同时被特许参加“七七团”的算术课学习。老师们也乐意在课后对同学进行辅导，我也常到老师寝室去请教，相互间亲如家人，情同手足。

老师还鼓励我们多看课外读物，并指导我们出壁报。我那时虽然还仅是一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却看了不少书。图书室有关童话、故事、戏剧、小说这几类书籍，差不多都被我看过了，当我第一次看完《水浒传》后，引起了我对它的浓厚兴趣，促使我在中学时代看了大量的新、旧小说。那时我不但能写信，还能给壁报投文字稿和画稿。记得在我读三年级时写的《我在抗战中的进步》一文，还被院里选送到保育总会参加全国保育生的优秀成绩展览呢！

（三）体育。每天天未亮，起床铃声一响，值周老师的口笛声就紧催着孩子们赶快起床集合了。我们迅速掀开铺盖，穿好衣服，拿起童军棍、带上小毛巾，就跑出寝室到院坝中心整队出发了。童军教练刘老师总是那么精神地吹着口哨或喊“一、二一！”带领我们行进在朝雾中。在走过一段两边水田的石板路后，爬上场口那块经过师生们用汗水平整出来的炭渣操场上，进行跑步或队列操练。然后迎着晨曦，呼着抗日口号，前进在古镇的街道上，唤醒了睡梦中的人们。离场后则慢步行进，深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并在道旁小溪中洗漱后返院，整理好内务，即开始朝读。

课余时间，我们也常进行跳绳、踢毽、跳房、打翘、拔河，打擂、抛沙袋等活动。由于经费紧，我们很难有洗热水澡的机会，所以，主要靠下河洗澡，这样，我们也就初步学会了游泳活动并培养了我至今数十年坚持冷水浴的习惯。

（四）美育。院内有三种不同的组织体系，，分管着我们的学习与生活，生产劳动，文娱活动与社会工作。第三种侧重在“兴趣小组”，实属美育方面。这里面有合唱团（歌咏队）、话剧组、讲演组、小先生工作队和防空情报组等。每人根据爱好参加一、二个小组，经过一段时间，取得指导老师同意，可以转入他组。各组平时按规定时间，在老师指导下，开展培训活动，节假日在院内举行娱乐晚会，进行表演，逢场时就作街头宣传演出。

在1939年夏、秋的某一赶场天，我作为演讲组中的一员，随队上街宣传。宣传队先在庙前坝子中间围成一个圈，锣鼓一响，唱上两支抗日歌曲，老乡聚拢来后，老师让我站上一张凳子，向大众血泪控诉日本军队杀人放火的滔天罪行。当我讲到自己一家三口遭到敌人杀害的惨景时，早已泣不成声了，听众也纷纷落下了同情的眼泪。这时，领队的老师及时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口号声振荡在古镇上空，回旋在穷乡僻壤间。不久，我转到话剧组，在不满两年的日子里，我先后参加排演了七个剧本：在《放下你的鞭子》中，我扮演那个挨鞭子的小姑娘；在儿童剧《小游击队员》中扮演那个机灵勇敢的外号“小眼睛”队员。

（五）劳动。当时按生活需要，分为缝纫、打草鞋、喂猪、放羊、种菜等生产劳动组织，内分若干小组。属自我服

务性质，从中培养劳动习惯，养成“自己的事自己干”的良好习惯。全院保育生参照自愿、根据需要、条件和各“团”生活老师意见，每人分别编入一个组里，经过一段实践后，再转入另一工种。我在短短的两年中，除学会针线活外，还专门学会了打草鞋和种植蔬菜。

那时我们都勤奋好学，各方面的知识与日俱增，心绪开朗，身体健康。我常名列前茅，中途跳级；会唱歌、演戏，能登台讲演；能写会画，并初步学会了游泳；同时，还是防空情报组中3个“小精灵”之一。我从不打架、骂人，能尊敬老师、团结同学，还能帮助弱者：低班有个八九岁的麻面小盲童叫傅继元，有时受到个别难友欺侮，我看见时就出面保护，他有事也爱找我，常亲切地喊我“金轩哥！”因此，我与同学们的关系融洽，也常受到老师称赞。

我虽然只在直三院生活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以后就被相继调去直二院、直八院，但这段时间对我这样一个刚来自农村的蒙昧无知的少年的健康成长及以后的全面发展来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可以说明环境与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关系和所起的重大影响。在半个世纪后的现在回顾这段亲身的生活历程，感到十分亲切和欣慰。

赵君陶同志受命于危难之中，为祖国保育难童，创造性地兴办教育，探索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思想和所走的道路有其独特的闪光点。这是她留给我们民族和后人的一份极其宝贵的遗产，它给了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特别在当前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在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强调贯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上，更值得今人借

鉴。

于中共南溪县委党校

1989年5月 初稿

1989年7月 定稿

注：赵君陶（1902~1985）系全国政协第二、四、五届委员，北京化工学院前副院长。

1989 10 6 21

回忆南溪县地方国营工业发展概况

（1956——1984）

张心惠

我县地处长江上游，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境内有丰富的煤炭、石灰石、天然气等矿产资源。

建国前大小土采煤矿分布于黄沙、大观、新添、石公等乡，至今煤田遗址到处可见。石灰石主要是农民利用农闲时间制石灰，用于民用建筑。天然气没有开发。建国前夕新添乡全福煤矿较大，有职工24人；十几家小砖瓦厂、土陶厂和一些小酒厂、小油厂，生产规模小，每厂职工几人至十几人，生产方式落后，全是传统的手工操作，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劳动强度大，安全无保障。煤矿工人下井劳动，赤身裸体，除了拉煤船的纤帕外一丝不挂，手工操作，产量很低，在1954年全县大小33个厂，生产总值只有